



歷史與文化

賀雲翱 著

历史与文化

贺云翱 著

中国人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文化/贺卫方著.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2

ISBN 7-80076-843-0

I. 历… I. 贺… Ⅲ. 历史—关系—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K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3198号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787×1092 1/32 176千字
印数:1-5000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铁道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 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大32 印张:17

字数:45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2元

自序

我1982年初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南京博物院，转眼已将近十四个年头。回首往事，既有过风风火火的时候，也有过冷冷清清的日子，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师长、朋友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给我帮助和力量，这份珍贵的感情是永远无法偿还的，也是用任何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如今，对我来说，许许多多的往事已平淡如水。人世沧桑，转瞬即逝，我们应当把短暂的生命时光奉献给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个读书人，推进文化进步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永远的理想和追求。对过去，我只有心存感激和美好的怀念。

十几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做编辑，科研时间极少，写作的文字大多是些辞书、鉴赏、译作、考古报告或讲义之类，象样的论文不多。这次，在朋友的一再督促和鼓动下，我摘选了38篇不同类型的文稿，组成这部小书，它们的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类近乎历史文化地理，二类是考古与历史，三是有关文化史、博物馆及其他。这些文章存有一种内在联系：基本上属于历史与文化范围，此即本书取名的缘由。它们中有的曾经发表

过，有的一直躺在抽屉里；部分尚可阅读，部分则纯是一般性的综述，有的甚至显得相当幼稚。还有的是几年、十几年前的体会，材料和观点都已较为陈旧，我自己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它们毕竟代表了我在学术上曾经有过的探索和足迹，对我来说，把这些不成熟的文章编写成集子，还是前一阶段工作的总结和纪念，或许亦可以为那些对历史和文化有一定兴趣的同志提供点滴参考。归纳起来说，编写这本书的目的一是不揣浅陋，以求友声，二是感谢师朋，回报生活！

在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我要感谢中国人事出版社的石中元、谭东琪先生，他们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大劳动。又蒙郁心游同志帮助设计封面，黎仲义先生和黄瑞同志帮助清绘插图，朱明德、严守喜等同志也为本书的顺利完成协助我做了不少工作，还有我的爱女贺晏然，忍着手上的伤痛，熬了几个夜晚，协助我处理书中所有插图。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7月20日于南京郊外龙泉寺

目 录

自序

论长江三角洲及太湖平原史前文化和环境的关系·····	(1)
长江三角洲地区史前聚落的考察·····	(11)
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	(22)
历史上“东南”地域考·····	(29)
徐国史初探·····	(37)
徐国史研究综述·····	(56)
吴文化研究三论·····	(68)
吴国城市建设述略·····	(78)
谈百越文化的两个问题·····	(88)
吴越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93)
《吴越文化》编撰纲要·····	(102)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艺术初探·····	(113)
从考古发现谈中国南方隋以前的域外文化输入·····	(134)
《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编后记·····	(152)
长江文化研究的两点设想·····	(156)
长江文化研究三议·····	(166)
论马家浜文化自南而北传播·····	(177)

良渚文化“祭台”遗迹初探·····	(188)
中国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体系中	
不同文化圈之形成与交融·····	(195)
原始人类居住情况综述·····	(218)
从考古学看中国上古城市建设·····	(235)
也谈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264)
南方六朝墓中出土文字杂识·····	(269)
漆木器概说·····	(276)
谈谈实验考古学·····	(283)
近年考古学学科发展综述·····	(293)
文物考古界的一项新课题·····	(302)
中国古代的墓地与埋葬制度·····	(307)
从考古资料看两汉时代的江苏经济·····	(381)
江苏史事小考三则·····	(409)
明清时苏州和外地的商品交往·····	(423)
民国时期的文博考古与图书馆·····	(434)
博物馆与考古学·····	(504)
文化研究在社会历史类博物馆中作用刍议·····	(514)
博物馆科研工作杂议·····	(521)
短暂的生命 不息的光华	
熊海堂教授学术生涯述忆·····	(528)
《中国历代名人像》序·····	(538)
重修龙泉禅寺记·····	(550)
后记·····	(552)

论长江三角洲及太湖平原 史前文化和环境的关系

自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的早期历史已大大突破了旧史家的时间框架，它把这一地区的开发史从夏商时代提前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本地是全国最早的稻作中心之一，有着独特的文化面貌，从七千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到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乃至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本区人口不断增殖，聚落密度越来越大，文化现象也愈益复杂。过去，考古和史学界在这一区域的社会史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这一特定空间和时间内的史前文化是如何形成、发展、传播等问题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文化和环境的关系角度入手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农业文化的起源、传播和环境 对它们的制约

到目前为止，位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西部，地属宁镇山脉、宜溧山地和浙西山地的溧水、丹徒、宜兴、句容、金坛、建德、衢州已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活动遗迹⁽¹⁾，而本区除紧靠宁镇山脉和宜溧山地的山丘上有过旧石器时代遗物出土外⁽²⁾，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湖州一线以东从未有过任何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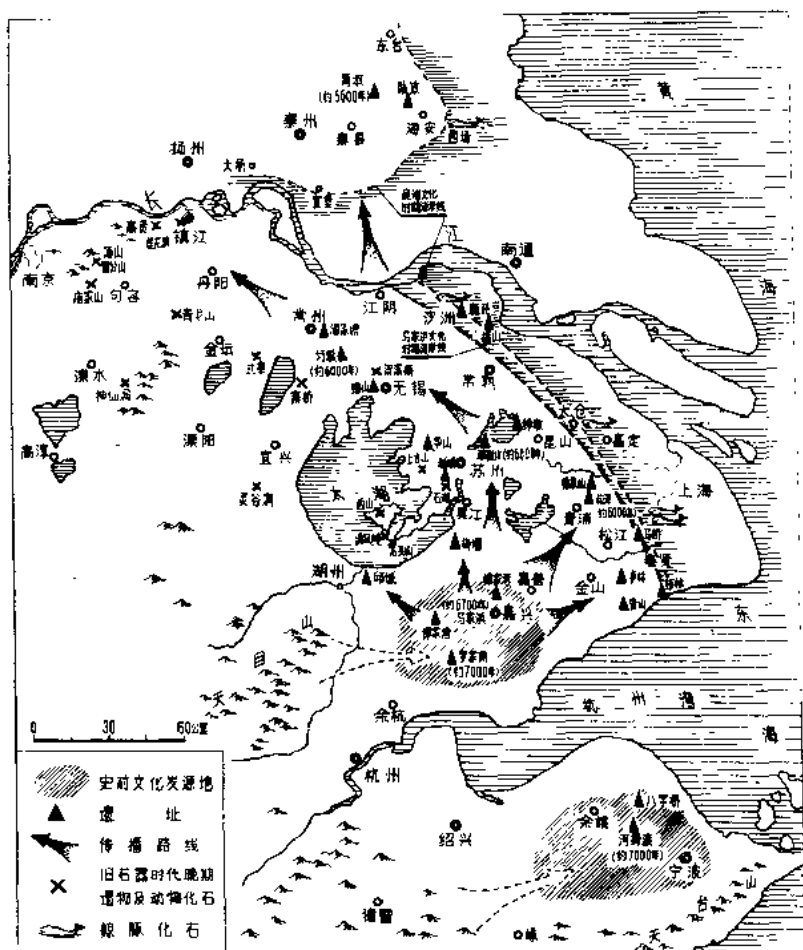
的发现。^{*}考察史前文化的发展规律,人类居留地是逐步由高处向低处迁徙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人类一般都生活于山上,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才逐渐在山麓地带和低山丘陵上居住。这种居留地的变迁过程体现了人类由猿人到智人,由采集狩猎经济到农业经济,由迁徙无常到定居,由树居、洞居到室居的历史进化过程。本区除了少数海拔不高的蚀遗山丘外,基本是广袤的平原,地理条件决定了它被开发的时间不会很早。全新世早期,本区北邻里下河地区还是一片沼泽,东南两面又是无际的大海,所以,它不仅开发时间较晚,而且其文化也直接导源于西部的丘陵山地。目前尽管在杭嘉湖平原发现了7000年前的村落遗址^[3],但根据遗址较为发达的文化面貌和相当进步的生产水平,可以说它们肯定不是刚刚诞生的农业文化。它们具体的起源地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又是从哪条路线向平原上迁徙的?这不仅是关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文化起源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的重大学术问题。

我们认为,钱塘江两岸的天目山、四明、会稽、龙门山地和杭州湾构成的三角地带是本区最早的农业文化中心。这一文化发源地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生态背景。首先,这里有野生稻资源,不少研究水稻起源的文章中都肯定了这一点。其次,它的地理位置偏南,温度较高,现在七月平均气温和福州、台北等地一样,为28℃,一月平均气温在4℃左右。一般说来,一个地区全年活动积温在3500—4500℃之间,水稻就能得以很好的生长,何况马家浜文化时的年平均气温还比现在高2—3℃,这更加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天目山和四明诸山背风向阳的山麓地带,直接受到阳光的照

* 此说已被新的考古发现所否定。1985年5月,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太湖中的三山岛一处旧石器地点作了发掘,发现一批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材料,但其经济形态尚无法推定,见陈淳、张祖方等:《三山文化——江苏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载《南京博物院集刊》9,1987,江苏美术出版社。

射,使温度资源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冬季,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寒冷季风为天目山所阻滞,而夏季东南海洋季风却畅通无阻地进入三角区,带来了丰沛的雨量。得天独厚的日照温度和降水诸因素成了先人们在这里从事野生稻驯化、栽培的优良条件。有的学者曾指出,中国稻作农业也象西亚、东北非、东南欧、美洲大陆一样,仍是起源于山地⁽⁴⁾,也就是说,天目山、四明山的向阳山麓地带可能是本区农业的孕育地点,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资料来证实这一观点。但可以肯定的说,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上的早期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都是次生的,它们是从附近另一个(或多个)更早的起源地点迁去的(参见附图)。

今天,我们能够给出明确回答的是,杭嘉湖平原为本区史前时代最早的农业区域。大约 7000 年前,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独特的水乡文化,他们使用石斧、石刀开垦土地,种植水稻,制造釜、盎、罐、盆等炊食盛贮陶器,能编织加工芦苇器具,以兽骨磨制箭镞用于狩猎,已经饲养家畜。杭嘉湖平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本区次生农业文化发源地,固然与本区农业文化起源于天目山和四明山等山麓地带有关,但其他地理因素也不可忽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海侵的影响,大约 8500—7000 年前,本区遭受了一次海侵,⁽⁵⁾海侵证据主要遗留在长江三角洲的东部和南部(包括相邻的宁绍平原)。海安青墩、上海崧泽两个遗址的生土层孢粉分析资料都反映出当时有一定数量的藜科植物,说明遗址所在地曾受过海水的浸润,从而含有一定的盐分。上海广富林、亭林、浙江河姆渡以及青墩等遗址,生土层皆为青灰色海相亚沙土或亚粘土结构。河姆渡遗址微体古生物分析结果是文化层从下往上渐由咸水沼泽相过渡到淡水陆相。上海青浦林家草地面以下 2 米处发现过海相沉积层,出土的牡蛎壳 C^{14} 测年为 5875 ± 185 和 5710 ± 180 年(未经树轮校正),浙江奉化前江出土的牡蛎化石 C^{14} 年代是 8235 ± 120 , 8055 ± 120 。但是,位于杭嘉湖平原中部的浙江桐乡一带因其地势较高,基本未受到海侵影响,当人类在这里从事农业活动时,太



湖平原东部的海侵影响还未完全消除，林家草的海相层 C^{14} 测年就是明证。由于海侵对本区不同地域有着不同影响，很自然，杭嘉湖平原就成了人类从山麓到平原从事农业活动的第一块落脚点。从地表景观来看，太湖平原虽然也未受到海侵的影响，但在它的

陆地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而杭嘉湖平原上则是以草原和沼泽为主。显然，对于使用石器从事土地开垦的原始农人来说，后者更利于开发和利用。

本区已经考古调查、发掘的史前聚落遗址，如浙江境内的马家浜、罗家角、邱城，上海的崧泽、福泉山、查山，江苏的梅堰、草鞋山、越城、华山、锡山、潘家塘、圩墩、茆墩、青墩等遗址，其最早地层的文化都是马家浜文化，以下便是生土层，也就是说，马家浜文化地层的年代代表着人类在这里最早的农耕活动时间。

对本区考古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马家浜文化是自南而北传播的。它先在杭嘉湖平原上发生、发展（约 7000 年前），数百年后才向太湖平原上传播（约 6500 年前左右）。C¹⁴测年和器物标型学都证明了这一规律。以罗家角、邱城、崧泽、草鞋山、圩墩、青墩几个遗址为例，这些遗址中，以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年代最早，距今 7040 ± 150 年，其他几个遗址的 C¹⁴测年依次是 6730 ± 125 （邱城）、 6019 ± 140 （崧泽）、 6275 ± 205 （草鞋山）、 5940 ± 135 （圩墩）、 5645 ± 110 （青墩）。它们明显地表现出在地域上由南而北的时间递减规律。

马家浜文化陶器的标型学分期结果和 C¹⁴测年表现的规律基本一致⁽⁶⁾。我们也曾把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器物 and 太湖平原以及江北地区有关遗址发现的陶器做过比较，发现后者明显具有时代偏晚的特征。当这一文化跨越长江到达本区最北部时，已是它的尾声，在时间上和早期的文化相隔达 1000 多年。

马家浜文化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传播方式和路线？环境对它产生过哪些影响？当然，这种传播过程最重要的取决于本区文化起源地点偏在南部。其次，就是人们生存空间的制约，杭嘉湖平原东为东海，南是杭州湾和宁绍平原，而宁绍平原上当时已有河姆渡文化的部落人群在活动。西部则是天目山地，村落只有向北发展，才符合 6000 多年前已经具有相当水稻种植能力的马家浜文化人群的需要。另外，正如以上分析，长江三角洲平原因受海侵的

影响。沼泽化的土壤淡化相对较晚，太湖平原的陆地和蚀遗山丘上又是森林密布，史前农业生产者需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才能前去开垦。当马家浜文化在杭嘉湖平原发展了数百年后，人口数量逐渐增加，生产技能日益积累，太湖平原东部和长江三角洲平原上也已是草木葱茏、湖泊棋布，主客观条件的结合，遂使马家浜文化的创造者们迅速北移。当时的聚落分布是相当稀疏的，原因是原始农业时代，“任何人群所需要的是开垦更多的土地，而不是增加对原有土地的利用，用考古学的术语来说吧，这些因素可能促使农业文化的迅速扩散，也导致定居初期的人口保持相当稀疏的程度……”^{〔7〕}，这和马家浜的文化传播与分布的情况正相吻合。

环境对文化区的形成及文化兴衰之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总会打上周围环境的烙印，愈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环境对文化的作用愈大。实际上，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是指物质形态的文化，也就是反映当时人们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建筑风格等等的物质类型和组合模式，而这些物质文化恰恰要受到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史前时代的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产作物和其他经济活动，也决定着一个地区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习俗，反映在物质形态上就是特定地域的文化的一致。譬如，本区地势平坦，河湖广布，气候温暖潮湿，盛产竹木，先民们就巧妙地利用周围各种资源，种植水稻，并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应水田作业的石制工具；善于使用独木舟，造就了后代“越人利于舟”的交通特点；捕捞业、木器制造业和挖井技术发达；住宅建设以“干栏式”建筑为典型风格，地面房屋强调立柱和地坪的处理，立柱下加垫板防止下陷，地面用蛤蜊壳、草木灰和芦苇铺筑以阻潮湿；有一套与“饭稻羹鱼”生活相配合的陶制器皿等等。本区史前社会经济不仅内地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渔猎、采

集经济为辅,而且即使是最靠近大海的地带甚至海岛上^[8],人们也广泛从事农业活动,可见海岸文化要受到其所在地区腹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果把本区的史前文化和杭州湾以南以西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的山地丘陵海岸地区的史前文化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地因为环境的不同,在文化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后者常以渔猎经济,尤其是捕捞业为主,相对缺乏农业活动,所谓“贝冢遗址”就是这种海岸文化的典型遗存。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海岸地带的腹地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采集、渔猎经济的风格。

环境对文化区形成的影响还表现在先民们对地形、土壤和水热条件的选择上。据研究,史前农业生产者在认识土壤的差别方面是很内行的,他们可以把这种知识用来选择适宜于他们的种植物生长的最好土壤。我们认为,马家浜文化的创造者们也应达到了具备这种能力的程度,所以他们的居留地基本上选择在自然条件南北相似的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上,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有迹象表明,马家浜文化的最北端可到达淮河南岸。^[9]但至今未在淮河以北发现典型的马家浜文化或良渚文化的遗址,那里是以旱作农业为特征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这样的文化分布状况正与我国气候区划上亚热带和暖温带,土壤上起源于冲积平原草甸土或沼泽土的水稻土与起源于冲积土的旱作土相对应。

关于环境对文化兴衰的作用问题,过去学术界常常因为拍担“环境决定论”的风险而未予深入研究,但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历史时期,环境会对文化的兴衰起主宰作用,尤其是本区滨临大海,海面的波动和洪水随时会对人类的活动产生影响。我们在这里要阐述的是本区遗留的一个历史之谜,即史前时代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的衰弱问题。良渚文化距今时代为5000—4000年,它自1936年于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发现以后,目前已在本区调查到120多处遗址。考古界一致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已处在阶级社会的前夜,它有堪称发达的犁耕农业,盛行玉器,

商周时代作为祭祀天地的礼器琮、璧在这一文化中极为常见。出现了原始文字和高大的土台建筑，漆木器、蚕丝、竹编等手工业已较广泛的存在。产生了世袭显贵和奴隶。但这样一种先进的文化却在 4000 年前以后未能进入阶级社会，并在数百年时间内几乎消声匿迹，而到了 3000 多年前（相当于中原夏末商初），本区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固然在某些器物方面有承继关系，但从总的文化面貌上看，它们的区别是很大的，如马桥文化中的印纹陶、带釉硬陶、圈底器，陶器制作术中的泥条盘筑法，铜器，大量的半月形石刀等，都是良渚文化中不见的，而良渚文化中发达的玉器这时却绝无踪迹。两种文化之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具体的文化面貌上都有一种“断层”现象，这种“文化断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至今尚未有任何研究。

我们认为，良渚文化的衰弱是由于环境的变迁引起的。良渚文化晚期，本区遭受了一次水灾。这次水灾淹没了许多聚落和农田，使原来的小湖泊迅速扩大。地下水位上升，迫使本区人口陆续分散，进入到浙西山地、苏南丘陵、宁镇山脉和中原地区。目前我们可举三方面的材料来论证上述观点。第一，本区良渚文化时期是史前聚落建设高峰时期，已调查发现的聚落遗址达 120 处以上，但比它时代晚数百年的马桥文化遗址至今发现的仅十余处，这种聚落数量锐减的现象应当是人类迁移的直接结果。人口迁移还造成良渚文化在其他地区的传播和扩散，在宁镇地区的江宁太岗寺，丹阳王家山，广东地区的石硖文化遗址，福建的昙石山文化遗址以及浙西山地史前时代晚期遗址中都毫无例外的发现良渚文化与各地文化交流的现象。马桥文化中也表现出它接受了浙南、闽北甚至赣北的印纹陶文化的影响，它的一些器型在浙南山地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中可以找到起源线索，这些正是良渚文化的创造者们在迁移过程中与相邻地区人类接触的直接反映。第二，在本区或邻区的一部分遗址中，良渚文化以及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地层上留有水灾的痕迹——淤泥层。经过调查发掘并确知的这类

遗址有浙江的白泉、唐家墩、水田畈、钱山漾、江苏的梅堰、团结村大三蓬等。第三，太湖的最终形成。关于太湖的成因和形成时间，目前地学界还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从考古学角度看，太湖的最终形成期是在良渚文化晚期到马桥文化之前这段时间，地理学者对太湖湖底做过考查，发现许多地方为土质坚硬的黄土，即它在成湖之前，这些地方曾是陆地。1949年以来，在太湖水底多次发现时属良渚文化时期的石器^{〔1〕}，也就是说在良渚文化时太湖至少比今天小得多，在后来成为湖底的高地上仍有人类居住。良渚文化以后，由于水灾的发生，使得太湖水面不断扩大，所以在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中就有了太湖的记载，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估计在距今3500年左右，太湖以及太湖以东的大小湖群已基本形成，水灾的影响逐步消退，迁入他地的良渚先民的后裔们和其他兄弟部族把新创造的文化和接受自其他地区的文化又一次带到了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后的吴越文化。

以上我们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平原上史前文化的起源、传播、文化区的形成、文化的衰落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因受制于考古资料和学力，有些仅作为一种观点提出，尚未给予最后的解决。本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同行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展开深入全面的研究，以丰富我国的历史学成就，并为当代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

注释：

〔1〕李炎贤等：《江苏溧水神仙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8（1）；黄正维等：《浙江哺乳动物化石新产地》，同前，8（1）；张祖方：《江苏省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李文明等：《江苏丹徒莲花洞动物群》，《人类学学报》，1（2）。

〔2〕《文物考古新发现，长江下游首次发现旧石器遗址》，香港，中国文物世界，1986，6。

〔3〕《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4〕孔令平：《西亚农耕的起源问题》，《历史研究》1979，6；李根蟠等：《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考》，《农业考古》，1981，1。

〔5〕海侵时间的确定，除考古资料可作证明，还参考了下列文章：陈以捷：《海洋贝壳 C14 年龄问题的讨论》，《第一次全国 C14 学术会议论文集》，1984；赵希搏等：《中国东部 20000 年来的海平面变化》，《海洋学报》，1979，2；黄家柱：《福建沿海新构造运动与第四纪海面变化》，《中国第四纪自然环境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王开发等：《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6〕陈品：《常州市圩墩遗址的分期》，《江苏社联 1981 年年会论文选》；殷志强：《略论马家浜文化的几个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5），1982，等。

〔7〕《考古人类学》，《四川文物》，1985，2。

〔8〕王和平等：《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1；《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1；《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2等。

〔9〕《江苏射阳湖周围考古调查》，《考古》，1964，1。

〔10〕《苏州市和吴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3；井焕章等：《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3。

（本文写成于 1985 年 4 月，曾获江苏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果评奖“优秀论文奖”。）